

“复杂现代性”论纲

汪行福

摘要 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无论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实践筹划的现代性都是复杂的。在现当代各种理论中,现代性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复杂现代性不仅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应该建构为新的理论范式。复杂现代性理论范式将突出三个方面的特征。(1)作为现代性自我证成理论,它是后形而上学的;(2)作为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它是非同一和非总体化的;(3)作为自反性和悖论性的过程,它是辩证的。复杂现代性范式具有双重性,针对现代性的矛盾和缺陷、失败和挫折,它是批判的;面向它的历史成就和合理潜能,它是肯定的。复杂现代性意识对思考中国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参照现代性规范和价值来自我定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不走歪路,只有充分考虑现代性背景和实现条件的复杂性,它才能少走弯路。

关键词 复杂现代性 规范性 事实性 非同一性 后形而上学 自反性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8.01.007

查尔斯·泰勒曾指出,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自我理解都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不仅现代生活的制度,如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现代生活方式,如个人主义、世俗化和工具理性思维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新出现的社会病态现象,如异化、物化和无意义感等,也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问题^①。因此,现代性问题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实现了独立,而且实现了富强。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现代性话语与中国发展道路及命运有了特殊

的理论关联。

关于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文明秩序转变的时期。金耀基说:“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而“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形态为参照的”^②。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实现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完成其“未完成的方案”。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中华传

^① 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 金耀基:《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形态》,载秦晓编《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页。

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特殊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包含着建构现代性的独特文化和精神资源。大体上说,前者在立场上多少偏向普遍主义,而后者偏向于特殊主义。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西方到底有多普遍?中国到底有多特殊?严格来说,这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

虽然现代性源于西方,但作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实践“筹划”,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展开和进行着的过程。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已经穿越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横跨了从欧洲到全球的地理空间。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竞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和战争破坏、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之后,已不再是“原初”现代性了。在当今时代,现代性不是固定的状态,而是各种力量较量的力场(force-field)。其中,任何原则、力量、要素的霸权倾向都会受到反制和挑战,任何主张和方案的自我证成都必须与他者进行沟通和对话。在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不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现实形态上,现代性都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面对这一变得非常复杂的现代性,任何简单化的思维不仅在理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两大问题特别凸显现代性的复杂面相。一是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二是复杂环境下人类的共存和发展问题。笔者承认,虽然现代性话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文化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之争,但它同时也涉及其自我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之争。为此,笔者尝试着把复杂性意识引入现代性话语,提出“复杂现代性”的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

一、复杂现代性是真实的“故事”

以复杂性理念和研究方法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就指出,现代性具有歧义性。他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驱动地球飞速发展的四部发动机。但是,今天这四部发动机皆因其失控而正在使地球陷入困境。如何面对这一困难和复杂的处境,莫兰说:“我不排除不确定性和倒退、甚至毁灭的可能性。但是在生成关于事态恶化发展的戒备意识之

后”,仍然存在着“改换道路以谋求一种新的起始”的可能性^①。他主张,在思考一切事物,尤其是人类事务时,都要抛弃碎片化、单一性和线性发展的简单性思维,树立以非中心化、歧义性和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性思维。可见,现代性的复杂性是由它自身发展带来的。

其实,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的意识并非全新的意识,许多先哲都以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触及现代性的这一维度。黑格尔是最早意识到现代性复杂性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的辩证法的思想家。黑格尔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世界中自由理念和实现条件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黑格尔把康德对人的道德自主性的强调与浪漫主义对个体和共同体的本真性的强调结合起来,既批判了启蒙理性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自由,也避免了浪漫主义非理性的整体主义意识。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试图把现代性规范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阐述了一个既保护个人自由和自主性,又具有实质伦理性的现代秩序,充分地揭示了现代世界中自由的复杂性,因而可以视为复杂现代性理论的开端。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关注的也是“复杂社会的自由”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脱域”(disembedded)和“嵌入”(embedded)概念,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波兰尼指出:“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具体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在他看来,人性的需求和价值是多方面的,不可能靠任何单一制度来满足,正常的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波兰尼认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②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和市场对社会整体的“脱域”,它不仅把土地、货币,而且把劳动力(人本身)变成了商品,市场完全脱离了人性的约束,变成了碾碎一切的“魔鬼磨坊”。在波兰尼看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简单化的思维都是有后果的,“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

^① 埃德加·莫兰:《现代性的危机》,陈一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1期。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①,却没有看到市场的任性和强制也同样是罪恶。为了拯救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波兰尼提倡复杂性思维。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生存依赖于双重运动,一方面是从社会到市场的运动,它把人从传统伦理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生产和消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须有一个从市场到社会的“反向运动”,否则资本主义就会走向极端,陷入危机,破坏人类生存依赖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因此,市场经济需要重新嵌入到社会机体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制约。波兰尼认为,合理的社会需要调和生产和消费自由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冲突,形成一种能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这里,“市民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心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经济自由调节的机制了。”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对私有财产权和经济交换的依赖,波兰尼明确指出:“仅仅只有关于权利的宣称那是不够的,需要让这些权利发挥作用的制度”^②,为此必须把还未得到承认的公民权利添加到人权法案中去,而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所走的道路。

英国社会学家 T. H.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也体现了一种复杂现代性的意识。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类能否通过稳步的、哪怕缓慢的进步,直至每个人都成为“绅士”,即能够过体面生活的人。T. H. 马歇尔认同这一思考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对生活标准的定量评价(quantitative assessment)需转向把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定性评价(qualitative assessment),前者依据的是消费品和享受到的服务,后者依据的是文明和文化的基本要素”。马歇尔主张:“公民权是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个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③在马歇尔那里,公民权问题实际上是人的自由和实现条件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公民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即 18 世纪的市民权、19 世纪的政治权利和 20 世纪的社会文化权利。在现代社会,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种权利,才能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马歇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主张

保留自由市场要素,但也认为,为了实现平等公民权的理想,国家必须运用它的强制力,通过福利制度克服阶级对立。马歇尔明确提出,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复合社会”(hyphenated society),其中代议制民主、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因素应该结合起来。在马歇尔这里,复合社会不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意味着每一种要素都能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而“复合社会”强调的是,市场、福利和民主是同一社会的不同要素,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构成社会的轴心原则,这样的社会,“它催生的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使三种模式得以完善的混合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金牛犊(golden calf)于是转变成了由三头圣牛所牵引的三驾马车”^④。显然,马歇尔的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社会中实现自由的方案。

我们再转向当代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把“脱域”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所谓“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⑤。在前现代性阶段,人类的生活是被置于相对狭小的地域性空间和相对不适应的文化空间之中的,在全球市场经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和新的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变迁之后,传统的生活背景瓦解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从对传统的依赖转向对新的知识和制度系统的依赖。相对于传统的知识和社会关系,新的知识和制度系统是高度专业化和抽象化的,因而给自我定向和人际关系协调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现代性的反思中,吉登斯多方面地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构成及其后果的复杂性意识。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制度丛。与古典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单一维度的强调不同,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涂尔干所强调的工业主义、韦伯所强调的合理化和监督体系以及他自己强调的暴力一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第 218 页。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第 213~214、216~217 页。

③ T. 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3 页。

④ T. 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 134~135 页。

⑤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 页。

军事体系四个方面的制度构成的。同时,现代性既不是福音,也不是陷阱,而是充满风险和机遇的地方,“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①。对待现代性,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历史目的论的终极意识。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幻想,“对历史更深刻的理解意味着行动的更大透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历史过程的更有力控制”^②。但是,“甜蜜理性”(sweet reason)并非总是奏效,它经常会遭遇挫折和失败,这不仅仅因为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类知识的缺陷,而是因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处在他的行动的影响之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不是命定之物,而是人类的筹划,不可能完全避免“设计风险”和“操作风险”。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是“脱嵌”,它一方面表现“解传统化”,在这里,传统与习俗越来越被专家知识取代,而专家之间在几乎任何问题上又是相互对立的,因此,知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解地域化”,即“日常决策与全球化后果之间的这种不断增强的特殊关联,以及全球秩序反过来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共同组成了新议程的关键主题。”^③显然,无论是解传统化还是解地域化,都意味着人类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卷入到自身的活动所产生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

在《自反性现代化》中,乌尔里希·贝克把“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作为现代性的特征。贝克区分了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或第一现代化和第二现代化。第一现代化是简单现代化,它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抽离。第二现代化是更为复杂的现代化,是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抽离。正因为如此,在复杂的现代化中,生活越来越远离已有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卷入越来越深的自我抽象和反思之中。贝克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具有“自反性”,这里的自反性不仅意味着反身性意义上的反思,即任何知识和规范都需要反思地加以理解,并做出选择,而且是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即行为结果与其意图和目的对立。当今时代,工业社会的思想和行动无意识地产生出各种不受欢迎的后果,并破坏现代社会自身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了现代化的两次抽离,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某种原初的确定性,无法回到启蒙时代的现代性信念,“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

性,个人却不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决策,即考虑到可能的后果”^④,因而需要寻找新的社会调节形式。

哈贝马斯思想中也包含着对复杂现代性的思考。在他看来,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现代性的认识过于简单,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两面性以及新变化。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生活世界与系统已经“脱钩”。随着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的解体,出现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因此,意义的理解成了问题;随着传统伦理共同体的解体,社会经济和行政系统脱离了生活世界的约束成为独立的力量,自由、意义和团结等价值日益受到金钱化和权力化的威胁。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理解为社会的复杂性与现代性的规范期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问题。“一方面,出现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这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包括诸多功能分化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把个人行动者推入‘当事人’这样一种边缘地位,使他受到自成一体系统的不确定状态的摆布。另一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期待,即这种不确定状态是可以驯服的,是可以用行政权力的干预、也就是通过福利国家的预防性或反应性的导控行动,而在规范上加以驯服的。”^⑤为此,他提出现代性的解放理想不能再回到原来的自由人联合的乌托邦。哈贝马斯认为,“在复杂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导控能力”^⑥,而是公共领域的民主力量。易言之,复杂社会的自由既不能依赖金钱调节的市场,也不能依赖权力调节的国家,只能依赖交往自由的制度化的民主才能对市场体系进行社会的、生态的“改造”,对行政权力的干预进行有效的“控制”。显然,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②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③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4页。

④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第12页。

⑤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03~504页。

⑥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46页。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复杂现代性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无论人们自觉与否,中外学者实际上已经以各种方式触及到这个主题。但是,迄今为止,思想家所做的努力还是不自觉的、非系统的,远没有把它作为独立论题加以全面思考。我们承认,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它都已经被大大地改写了。首先,现代性不再仅仅是西方的故事。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现代性事业都已成为人类共同故事。其次,现代性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故事。在过去的二百年间,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危机、改革,出现过法西斯集权主义的惨痛教训。同样,过去一百年间,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也经历了激动人心的伟大试验,如苏联体制的失败和斯大林主义的惨痛教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成了当代思想家共同反思的对象。再次,现代性不再仅仅是现代化的故事。长期以来,解决物质稀缺和获得经济安全是现代性的核心冲动,但是,物质发达并没有带给人类以普遍幸福,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也没有带给人类更大的安全,特别是在生态危机出现后,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现代性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现代性理论需要突破已有的各种理论的限制,吸收各种有益观点,重绘现代性地图,而“复杂现代性”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复杂现代性理论新范式

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复杂现代性”范式意在肯定现代性规范诉求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强调现代性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上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复杂性渗透在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思考。其一,现代性诸规范及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上的复杂性;其三,现代性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1. 现代性在规范层面上的复杂性。

人们往往把现代性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一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口号,理性和批判成了实现进步的条件。但是,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在经历各种思潮

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的中介和改写之后,在规范层面上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了。按照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18世纪的主题是个人自由权的平等,19世纪的主题是政治权利的平等,20世纪的主题是社会权利的平等。虽然这些规范仍然具有普遍性,但其内涵已经超越了特定国家和时代的限制,成为现代性话语争夺的对象。

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不承认自由,但对自由却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就是思想和行为不受约束的状态,因而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作为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传统把自由理解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状态,于是有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观念的对立,这两种自由都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却又存在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在平等问题上,自由主义偏好法律和机会平等,社会主义强调资源平等和结果平等,然而,这两种平等均既不可缺少,但又往往相互冲突,显然“何谓平等”也成了一个问题。虽然民主尚未成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形式,但是,作为现代性规范,它也具有普遍的正当性。问题是,我们追求的民主为何,是精英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是议会民主还是大众民主?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且更重要的是,上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解上的差异和冲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它们代表的是复杂社会中人们对现代性规范及其实现可能性的不同理解。

实际上,现代性在规范领域的分歧远不只上述故事。在过去二百多年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现代性规范和价值,譬如,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中,出现了民族独立和自主性要求;在反对男权主义和异性恋婚姻制度斗争中,出现了性别平等和婚姻形式多样性要求;在反对工业化和生产主义斗争中,出现了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要求;在反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出现了文化自主性和生活本真性要求,等等。现代思想史就是现代性观念冲突和斗争的历史,在这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生产主义与生态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论、世俗化与宗教、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之间的矛盾冲突,都进入到现代性话语之中,挑动着人们的神经,引起各种意

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冲突。

由此观之,如果现代性的规范与价值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在既定的条件和情境下,它们往往是相互冲突,或者说是无法同时实现的,这样一来就需要进行价值排序,根据轻重缓急做出取舍。在这里,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现代性价值的排序和优先性的理解上的不同,必然导致现代性的具体形态和特征不同,由此产生了现代性历史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对现代性的反思需要一种规范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对现代性规范和价值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面具或政治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也不能浪漫化地相信,好东西总是相容的,或现代性诸规范和价值自在具有自洽性,仿佛现代性的弊病与现代性设计无关,完全是由于操作失误。其实,现代性不是上帝的计划,也不是历史本身的目的。它不过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努力实现更好生活的历史一实践筹划。在这里,没有“终极词汇”,也没有完美的统一性,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我们要对现代性规范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保持敏感性,避免在规范层面和理念上陷入绝对主义教条和乌托邦幻想。

2. 现代性在制度和事实层面的复杂性。

关于社会制度,有两种典型的话语类型,一是黑格尔式的对制度的实践理性解释,它把一切合理的社会制度都理解为自由意志的对象化形式,并强调,任何制度都不能仅仅从实存出发,而且要从概念即其内在应有的本性出发进行评价。另一种是韦伯式的对制度的权力主义解释,它把制度理解为独立于人的动机和意志的外在秩序,一种只需根据其外在的经验效力而无需根据其内在的规范加以评价的社会体系。总而言之,黑格尔式理解强调社会制度的规范和理性方面,韦伯式理解则强调社会制度的经验的和实效的方面。其实,社会制度既有与规范相联系的内在方面,也有与社会约束和适应环境相联系的外在方面。易言之,一方面,制度总是人类的实践创设,是为了人类的目标服务的,因而需要联系规范和价值要求加以评价;另一方面,制度也是人类在适应现实环境中形成的稳定的规则和组织系统,需要承担社会整合和协调的作用,并维持自身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因而必须从其外部效力方面加以衡量。

这一双重视角要求我们以复杂的、批判的眼光审视现代性制度和客观条件。

以市场和行政国家为例,经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当然条件。它把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把社会理解为自利的个人之间竞争的场所,把市场体系理解为独立于国家权力和个人意志的理性交换系统。而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仅是经济合理化(计划)的工具,而且是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条件,它发展出一套计划经济体系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其实,无论在规范上还是经验上,这两种观点都陷入各自的制度神话。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平等,而且产生出比资本主义市场异化更严重的权力异化。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虽然给人们提供了消极自由,但没有产生出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荣所需要的自由、和谐的可持续条件。其实,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其正当范围内起作用,因而在空间和领域上总是受限制的。我们要意识到,人类生活依赖的制度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自身包含着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在这里,我们既要抛弃“权威即压迫”的神话,也要破除“制度即自由”的神话。对待任何制度,我们要考虑它们在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效果。

民族国家和现代技术也是如此。经典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在这里,国家是人口、地理空间、文化认同和政治主权四者合一的最高社会单元,它既承担着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和管理的功能,也是世俗化时代政治认同的对象和社会团结力量。就此而言,现代世界的许多成就是与民族国家分不开的,如国民经济体系、法治、工业化、民主政治、福利社会、世俗化、大众教育等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环境污染、气候危机等等,也与民族国家之间恶性竞争和它的霸权冲动有关。因此,我们不能把民族国家神圣化,我们也同样需要根据规范的正当性和应对经验挑战的效力加以评价,摆脱当今盛行的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

现代技术与其他的现代社会发明一样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加害人类。启蒙时代思想家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现代科学的知

识启蒙意义和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而当代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其意识形态本质和生态破坏后果,它们不仅批判技术对人的控制,而且批判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大致来说,前一种观点相信,现代科学技术总体上是进步的、积极的,现实中所出现的消极后果都可归入“操作失误”的范畴;而后一种观点则相反,它认为现代技术本身就是一个“设计失误”,当今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后果都是技术系统内生的。实际上,无论是工业技术还是今天的信息技术都是复杂的,既包含着技术自主论所批判的系统的强制性,也包含技术进步论赋予它的增进人的能力和自主性的作用。正如温纳所说:“现代人已经使世界充斥着大量奇异的发明和创新。如果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成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和改造,那么人类就可悲地面临一种永久的处境,即受其自身发明产物的束缚。如果我们还能够加以设想去拆解、学习和重新开始,人类就会有解放的前途。”^①在这里,对待技术也应该像对待市场、国家和民族等现代社会制度一样,既要承认现代科学和技术是现代性不可取消的基本要素,又要对其内在矛盾和复杂后果保持反思和敏感性意识,在控制和反控制、支配和人的自主性之间保持张力。

3. 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现代性是人类的事业,它既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观念和思想,也不能理解为无规范的客观自然过程。在现实过程中,现代性的规范因素与事实因素总是相互作用的。然而,理想与现实、计划与操作并不总是和谐的,无论是现代性观念的变化,还是现代性经验条件的变化,都会打破已有的平衡,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吉登斯、贝克、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反思现代性”、“风险社会”等理论已表明,现代性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早期工业化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自然环境和相对不变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在这里,风险更多地来自于自然,而晚期现代性是在人造的环境下展开的,它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于人类活动自身,因而具有更复杂的特征。现代性作为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这些矛盾以各种方式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节、失败、倒退、混乱等结果。吉登斯曾谈到,启蒙进步主义的“甜蜜的理性”之所以“变酸”既有设计错误,也存在操作错

误。其实,现代性作为主体与客体、规范与事实、个人与他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除了设计错误和操作错误外,还有其他的失败形式。譬如,“因成功而失败”:一个制度越是成功就越容易固化,进而失去对新的挑战和问题的应对能力,当今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困难其中有些属于这种情况。“自我反噬”,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瓦解它自身的基础,走向享乐主义和科层制。“溢出效应”,如在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外部性中,人类活动领域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领域的活动往往对其他领域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不仅如此,外部性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个体的活动与他者之间。“抑制效应”,如强势政府有其社会管理和经济调控的优势,但“抑制”了民间社会的发展,由此会损害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凡此种种都表明,在现代性过程中存在着规范与事实、意图与结果的矛盾,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因而,我们需要有一种对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

总之,现代性虽然受到规范和价值的引导,但不是某种先天地为我们准备好的蓝图的实现,也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过程。在现代性中,矛盾和冲突是广泛存在着的。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复杂性,才能保持着一种偶然性和可错性的意识,只有破除固定的、封闭的、线性的思维,才能使现代社会健康发展。

三、复杂现代性范式的若干特征

2003年5月,针对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一篇反战宣言,并阐述了“核心欧洲”的现代性经验。作者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城市与乡村、神权与政权、信仰与知识、阶级之间、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残酷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也已经从痛苦中学会了如何沟通歧义、整合矛盾以及化解紧张”。哈贝马斯列举了其中的重要方面,如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当成熟,政治与宗教之间泾渭分明,任何越界

^① 兰登·温纳:《自主性的技术:作为政治思想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的行为都会受到人民的怀疑；欧洲经历过现代化战争和技术灾难，因而对科技进步的悖论和风险有着敏锐的“启蒙辩证法”意识，不再对科学技术发展抱着天真和乐观态度；欧洲在经历过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的激烈的阶级冲突，经历过工人阶级革命和激烈的抗争，因而产生了驯服市场的批判意识，具体来说，“他们选择接受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社会安全保证，也接受以团结为基础的规范”。此外，欧洲经历过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二次世界大战，因而，“对于暴力的使用，他们所能容忍的门槛非常低。对于国际秩序，他们追求的是多边的合法管制，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希望改革联合国，并在此架构下推行一个有效的全球政策”^①。这里我们不评论哈贝马斯对欧洲现代性经验的总结准确与否，但是，他强调，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习，必须对现代性保持反思和批判态度，必须根据现实的变化调整现代性方案，则是需要肯定的。总而言之，现代性不仅是复杂的，且必然是非完美的，因此需要不断地反思、批判和加以修正。

新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显然是中国的崛起，它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的面貌，而且是全球的格局和未来的走向。有学者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下，“唯有透过内修文德，中国文化之复兴也即‘新生转进’，中国才有意愿、也才有能力见义而勇为，外平天下，膺承中国的世界历史天命”^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绝不应是物质富裕和国家强大，而且应该是富强转向文明，把民族复兴融入普世文明之中，化普世文明为中国文明，完成现代性计划。从复杂现代性视野看，这两种思路都存在着局限性。普世主义简单地重复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和西方现代化道路，没有看到现代性规范本身的复杂性、现代性方案本身的流变和不同民族对它的改写。传统文化复兴论过于轻易地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转进”和通达现代性的可能性，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结构差异。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西问题，也非完全是古今问题，而是在复杂现代性条件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完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复杂现代性理论直接地“转译”为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相反，我们应该把中国

的现代化放在现代性这个大问题中来考虑，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既受现代性约束又改变现代性构成的现实过程。

复杂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有多重背景，这里包括社会学前提、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难题等，在上述背景下，现代性事业只有基于自我批判和反思基础上才能继续推进。就思想特征而言，概言之，复杂现代性理论有以下三个方面特征：

其一，从哲学思维来说，复杂现代性理论首先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既非某个先天历史意图的展现，也不是某种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现代性的起源得益于一系列分散事件的合成后果。1455年谷腾堡发明印刷术使知识的大众传播成为可能；15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为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1520年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一种独立于神学权威的新的认知态度；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发现一个非基督教的世界，形成了新的人的观念、文化趣味和生活态度；16世纪宗教改革对天主教的批判和信仰的主观化，为道德主观化和个人自由意识提供了信仰前提；17世纪的“古今之争”在审美领域第一次明确确立现代对古代的优越性，在审美和艺术领域引入了求新、求变的意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人的觉醒和理性的高歌，它全面地推动了人的权利意识、科学精神和功利意识，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为资产阶级在欧洲的统治提供了条件，也彻底改变了政治合法性意识；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生产以及全球市场，使全球成为现代性的竞技场。凡此种种都表明，现代性的产生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它们都为现代性注入了自己的元素，也对后来的现代性发展产生各种影响。

现代性哲学视野的后形而上学性，并非仅仅指它的起源的历史性和偶然性，而且也指它的历史过程和结果的历史性和偶然性。吉登斯把现代性定义为“解传统化”，即现代性是以批判传统观念和生活

① 哈贝马斯、德里达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邓伯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 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

方式特征的。但是,在早期现代性思想中还存在着许多未被清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前提,它们不是把现代性建立在绝对理性或必然性基础上,就是相信现代性受到某种历史目的论的保障,因而还保留着一些错误的简单化观点。莫兰就认为,未经启蒙和自我批判的现代性意识有三个神话,即征服世界的神话、历史进步主义神话和人类幸福的神话。但是,这三个神话在生态危机、技术风险和大规模战争面前已经破产了。在今天,虽然我们不必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者所鼓吹的宏大叙事终结、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等等,但历史确实表明,现代性没有绝对的基础和终极目标。现代性是脆弱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可错的事业,我们既不能对它做历史决定论的辩护,也不能为它做历史目的论的辩护。现代性合法性的基础是现代性成就本身,同样,现代性的问题也是缘于它自己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能在现代性之上,也不能在它之外去寻找确定的立场对它加以辩护和谴责,我们只能既置身于现代性湍流之中,通过自觉地反思和批判,尽量把握它的发展方向。

其二,复杂现代性范式拒绝把现代规范和价值理解为绝对同一性的整体。哈贝马斯根据韦伯对客观知识、法律一道德知识以及艺术和审美知识的区分,把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规范。其实,现代性规范和价值远比这要复杂。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和普遍反思的时代,现代性价值既包含着自由、民主、人权、公正等保护个人自由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普遍要求,又包括个人追求个性和本真生活的个体化要求,包括追求文化认同、团结、环保等与集体共存有关的价值。这些价值所构成的系统既不是基于某个先验原则的演绎,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归纳,它们是对现代世界中人类遭遇的难题和挑战所做的回应。现代性没有统一的价值清单,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排序。在这里,规范和价值之间有时是互补的,有时是矛盾的,我们不能幻想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现代性计划。譬如,自由与民主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价值,多元文化与社会团结、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境、个人自由与共同体、情感与理性等等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承认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世界的非完美和非统一性。弗里德里

克·詹姆逊主张,我们在考察事物的差异和非同一性时,要区分“矛盾”和“二律背反”,矛盾是一种有缺陷的状态,而二律背反是事物的正常状态,在这里,对立的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正如帕斯卡所指出的:“一个真理的对立面不是谬误,而是一个相反的真理。”N.波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一个平庸的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①承认现代性价值中存在着二律背反和非自洽性,就是要排除对现代性的规范与价值的统一性和总体性幻想,避免在不同的现代性价值之间简单地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三,复杂现代性理论也包含着对现代性自反性(self-confrontation)的自觉意识。自反性并非偶然性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之中。《启蒙辩证法》是一部对现代性自反性进行反思的悲怆之作,在《启蒙辩证法》的开篇,作者就指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②,并认为“启蒙的自我毁灭”是第一个要讨论的对象。海德格尔对主体形而上学和技术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对应的客体性之中了”^③。现代性的自反性并非所有现象的特征,但也绝非偶然或罕见的现象。实际上,自反性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世俗化、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现象之中。我们要抛弃线性的、简单化的进步观念,承认事物在其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可能性。

但是,承认现代性的自反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宿命论和现代性失败论。现代性的自反性是现代性本身悖论之一,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下转第67页)

① 转引自埃德加·莫兰《论复杂性思维》,陈一壮译,《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 《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4页。

论断,澄清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与麦金太尔所诉求的“欲求——满足”式功利主义中立性之间的区别,并证明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正当性。可以说,巴利建立在理性协议基础之上的作为公道的正义,将确保人们对自主之善的追求,强调善的实现是在遵循公平决策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的,而不是诉诸自身特殊的善的观念。这正是巴利驳斥麦金太尔“偏私”论断而秉承中立立场的关键所在。而在麦金太尔那里,他将中立性等同于自由个人主义的结论,并把作为公道的正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善的观念;他借助“欲求——满足”式的功利主义,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与其所引致的中立性结论相混淆,继而否认这两种平行中立类型存在的不同前提。显然,麦金太尔是近视的,其理论论证与批评并不成立。实际上,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体现的是一种程序正义的结果,在其内部,不存在任何内置于作为公道的正义的特殊事物能够影响公平决策程序的裁决。

值得肯定的是,巴利作为公道的正义以公平的决策程序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制度设计与安排,它追求的是实质公道,并非形式公道,其内在于中立性保证了它的稳定性。巴利关于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论证,无疑是对当代社会正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对现实社会正义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巴利对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论证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要从根本上践行与落实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及其核心诉求,不仅需要依赖于社会制度的科学建构,而且需要社会文明与个人素质等方面的提升与保障。同时,巴利忽视对“合理性”的必要阐释,更是其理论论证上的一个缺陷,也成为后来批评者抨击的主要理由。

(本文作者:薛勇民 山西大学教授、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薛良喜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钟 河

(上接第 54 页)超历史的人类宿命,否则的话,我们就从盲目相信进步的必然性走到了另一极端,走向历史的灾难论。正如进步是不确定的一样,历史的倒退和毁灭的结局也不是确定的。韦伯、海德格尔、阿多诺、福柯和各种历史灾难论者的错误不在于揭示了现代性在具体现实中存在着自反性,而在于他们把这种自反性思辨地解释为现代性的必然命运。其实,危机可以变成转机,“自我转变的天赋会在危机的状态下觉醒”^①。

中国的崛起,既带来巨大的机遇,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责任。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仅要实现繁荣和富强,而且要建设新的社会秩序;不仅要选择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而且要建构自己的现代性方案。鉴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影响力,中国的选择无论对错好坏,对 21 世纪的人类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须以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和对世界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复杂现代性范式意在强化这样的意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是对规范敏感的,即合于人类文明大道,符合现代性的规范与价值,也必须是对现实敏感的,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事业必须是伦理的,也是审慎

的。同时,复杂现代性思维也包含着这样的辩证意识:在现代性成就面前,不放弃批判和反思的要求;在现代性的挫折和困难面前,不放弃希望和走向犬儒主义。复杂现代性既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同时也是基于规范和信念的建构意识。在这里,只有尊重现代性的普遍规范和价值,中国才能避免走歪路,与此同时,只有慎重对待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艰巨性和困难,才能避免走弯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号:15ZDB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汪行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景来

^① 埃德加·莫兰:《现代性的危机》,陈一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 年第 11 期。